

何干之与中共党史学书写范式的开创*

宋学勤 孔梓菲

[摘要]何干之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共党史学家，是中共党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何干之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在接纳和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较早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史研究领域，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维度探索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完善教学体系、建构党史叙事逻辑框架、拓展党史研究空间范畴等具体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党史思想，为中共党史学发展繁荣作出重大贡献。探索其唯物史观、党史观、中共党史学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

[关键词]何干之；唯物史观；党史观；中共党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2)06-0004-09

新时代以来，构建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是中共党史学履行新的使命与担当的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以现当代中共党史学家的重大党史思想资源为切入点，将他们为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的初创性贡献挖掘整理出来，从中发现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发展的“源”与“流”，是实现新时代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学术活动，值得深耕。何干之（1906—1969）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共党史学家，是中共党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何干之的研究或表现为阐发其生平及贡献的传记类论著^①，或聚焦于何干之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②，或从其论著文本出发对其重要思想进行专题论述^③。尽管既有研究丰富了对何干之思想及学术贡献的认识，但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仍与何干之在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共党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尤其缺乏对其党史思想的整体性揭示。鉴于此，本文拟以历史文本为依托，初步探索何干之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并推动中共党史学创建的思想历程。

*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项目号58112115522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炼：《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耿化敏、张立艳：《何干之研究述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汪兵：《回顾与趋向：近十年（2008—2018）何干之学术思想研究的进展》，《黑河学刊》2020年第1期；耿化敏：《何干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

② 耿化敏：《何干之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2期；耿化敏、王元力：《何干之与“胡风事件”》，《百年潮》2014年第1期。

③ 张静如：《何干之对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纪念何干之百年诞辰》，《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杨鑫洁：《何干之与中共历史研究》，《世纪桥》2011年第2期；康桂英：《何干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析》，《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康桂英：《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一、“史的本物论”：对唯物史观的接纳、阐发与运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国家积弱、民生困苦、社会思潮交汇激荡、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历史场域下，何干之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唯物史观成为其入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系统接纳、阐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何干之进一步将抽象的唯物史观具化到中国史研究领域，回答历史研究的本真意涵，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体系与思维框架，尤其通过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的引入，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中共党史学的创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20世纪20年代初，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国情，社会改造思潮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多元化国家和社会改造思想纷纷登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何干之所处的广州既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时值工人运动高潮，社会思潮与工人运动的双重影响，共同塑造了何干之纷繁复杂的救国思想雏形，推动了其社会思想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大转变。自1925年进入中山大学，何干之大量阅读中国共产党党刊《向导》周报、《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其学术兴趣开始由“传统国学研究”转向“社会科学领域”^①。在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的基础上，何干之在信奉“教育救国”的同时，进一步认同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撰写了大量反对封建家长制、反对教育氏族化、主张自由平等、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提倡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同步推进^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何干之开始走上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但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大多来源于报刊杂志宣传，思想并不十分成熟，呈现出“二元化”的表征，何干之将自身这一时期的思想评价为“当时的思想是二元的：一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在处理实际问题上，却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思想还在矛盾之中，依然相信着教育改造论”^③。

此后，何干之两度赴日本留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生涯，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复苏，马克思主义原典及研究论著集中翻译出版，大量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日本东京一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何干之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为了掌握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这是基础工夫”^④。因此，他依托日本丰富的学术资源，一方面系统自学《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另一方面则广泛阅读《普罗科学》《战旗》《产业劳动时报》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积极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1930年，何干之编写《现代世界观》讲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成为其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聚焦点。如其在《自传》中所言：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以及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⑤，不但使其彻底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奠定了其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为后续开展学术研究做了理论准备。回顾青年时代改造国家社会的种种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何干之对于早年信奉的“教育救国”思想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反思：思想变革只不过是社会经济转变的反映，因此所谓伦理变革先于政治变革、思想变革先于政制变革都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困苦，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旧制

① 何干之：《何干之自传》，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胡华、刘炼：《何干之传》，《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③ 何干之：《何干之自传》，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第5页。

④ 胡华、刘炼：《何干之传》，《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4页。

⑤ 何干之：《何干之自传》，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第5、8页。

度旧社会，劳苦大众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①。

20世纪30年代中期，留学归国后的何干之迅速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战线，系统阐发唯物史观，为中国学术界寻求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成为其首要任务。在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何干之深切认识到，中国学术界缺乏研究历史的科学理论：中国本土的史观教科书少之又少，“历史理论的落后是值得我们注意，而且要我们起来补救的”；而历史理论的落后，又致使“用正确的方法而写的中国历史读本至今还没有出现”^②。其所指涉的史学界所亟需的科学历史理论与正确方法，即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何干之将唯物史观称为“科学的历史观”和“史的物本论”，明晰了作为理论的史观与真实历史间的关联和差异，厘清了“史的物本论是历史的方法，历史是史的物本论的应用”^③这一唯物史观与历史本体的内在逻辑；明确了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基础常识和根本方法的关键地位；概括了唯物史观“以经济因素作为根源诠释历史，阐发人类社会相互转变的规律性”的基本内容。在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何干之以反思历史理论何以落后为切入点，指出中国哲学界只偏重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原则原理的输入，忽视了对理论通俗化、实践化的解读与运用。在何干之看来，建构适合中国需要的历史理论，不单要译介引入与学理诠释唯物史观，更要对唯物史观加以本土化运用，以“科学的方法来再认识中国社会的构造”^④，因此将抽象的哲学、史学理论具化到中国史领域就成为当务之急。

何干之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回答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阐明了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唯物史观认为：从历史行程的价值本位来看，历史是有机连贯且运动着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概念既相互生成、又彼此转化^⑤。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的来龙去脉，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所以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横剖面，对于它的纵断面，也必须同时了解的”^⑥，历史和现实不可分离，对于现实问题的彻底了解有赖于对历史问题的深入探讨。这一观点的提出，明晰了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是现实问题，历史研究的目标指向在于以研究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何干之进入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基于对历史研究本真意涵的认知，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史具体议题研究为依托，撰写大量论著，旨在厘清、阐明和回应现时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其中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议题的提出，肇始于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停滞，源起于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思考与论争，何干之通过对历史上中国社会形态样态及演变脉络的辨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适用于中国，有力地回击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明确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解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动力、前途等基本理论问题，从理论层面上为中国指出了未来“新的民主革命”的根本道路^⑦。对于近代启蒙思潮问题的探索则始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性凸显，抗日救亡运动

①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33页；胡华、刘炼：《何干之传》，《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5页。

② 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期。

③ 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期。

④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2页。

⑤ 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序论》，当代青年出版社1936年版，第5页。

⑥ 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期。

⑦ 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史相关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封建制长期停滞的分析》，《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5期；《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辑第1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论争》，《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辑第5期；《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基本问题》，《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辑第6期；《中国经济读本》，现实出版社1934年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代青年出版社1936年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9年版等论著。

亟需先进思想的指引，何干之坚持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探索各类思潮生发的场域，梳理了近代以来自洋务运动至新社会科学运动启蒙思潮的流变，在对近代启蒙运动的反思中提出了新的历史场域下的新启蒙运动要求^①。就其学术意义而言，这是第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解读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史，客观历史地总结了历次启蒙运动的得失经验，建构起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史的基本研究架构；就其现实意义而言，何干之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要求，旨在“扬起了一切有自信心的思想……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②，与中国共产党重构“民族自觉与自信”的历史任务相契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此外，何干之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③、鲁迅学术思想^④等议题的研究，也都源起于革命现实的需要，既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开展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参照，也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宣传的开展提供了学理支撑。

总体而言，何干之对唯物史观的接纳、阐发与运用，在两大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历史学视阈出发，何干之正是在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革命需要为目标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搭建起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诠释体系与解释框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回归历史本体研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领域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中共党史学视阈出发，对历史研究本真意涵的认知、对现实革命问题的观照为推动何干之转向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源动力和目标指向。何干之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革命路径等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精准判断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权威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的系统引入与解读，逐步建构起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话语体系，为中共党史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话语基础和理论准备。

二、党史观：建构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德里克在评价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强调了这一群体的革命性特征：“他们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⑤，历史学家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促使何干之由历史研究向革命史、党史研究转向。何干之将唯物史观引入并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维度关于党史研究原则、目标、方法的思考，以及得出的诸多科学结论，建构起何干之党史观的基本体系框架，是以正确党史观研究党的历史的生动体现，具有丰富内涵。何干之党史观的形成是其唯物史观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集中体现，为其指导自身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

何干之的党史观在本体论意义上表现为对“党史是什么”“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等问题的思考。从文字意涵出发，中共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历史事实的合集，党史的书

① 何干之关于近代启蒙思潮议题的研究包括：《新启蒙运动的争战》，《读书月报》1937年第2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认识月刊》，1937年创刊号“思想文化问题特辑”；《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等论著。

②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204、224页。

③ 何干之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研究包括：《三民主义研究》，新中出版社1940年版。

④ 何干之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包括：《鲁迅的人生思想》《在张家口鲁迅学会上的讲话》（1946年4月7日）；《鲁迅论文艺家的两极端》，香港《华商报》1946年10月19日；《鲁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斗争及其策略思想》《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一辑，第275~290页；《鲁迅思想研究》，东北书店1948年版等论著。

⑤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写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具体史实内容^①；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书写，也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为叙事主线的，因此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应当归属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范畴。针对当时历史研究对象禁区较多、对于中国革命中敌人与朋友的相关研究极度匮乏的学界现状，何干之提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要成为打击敌人、团结朋友、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②，因而“研究敌我友三方面”^③成为党史研究必须开拓的学术新方向。具体而言，研究敌我友三方面就是指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作为党史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内增加对敌人即反动军阀、国民党，朋友即民族资产阶级等对象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何干之所撰写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就是在这一党史观指导下的研究成果。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区别其中各个不同的集团和派别，在区别上建立不同的政策”^④，写作的根本目的是总结并宣传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历史经验。

在认识论意义上，其党史观表现为对“为什么开展党史研究”的思考。1942年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初步建构起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提出了开展党史研究的目标指向：研究党的历史是为今天党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⑤。何干之对于党史研究认识论的思考正是在遵循毛泽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重要指向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推进的。自20世纪50年代起，何干之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等多部著作，其谋篇布局与逻辑架构都凸显了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中，《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书在每一党史时期之后都专做一篇结语，以系统总结该时期党在革命中的经验教训；《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两书则专做最后一章，突出强调“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及“中国共产党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主要经验”。不仅在学术实践中，在关于党史研究及地方党史撰写的报告会议上，何干之也始终坚持探索革命斗争中的主要经验是党史、革命史研究与学习的重要内容^⑥。

在方法论意义上，何干之从党史研究需要贯通纵横的宽阔视野、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兼及政治性与学术性等几方面，较为详细地阐发了“如何研究党史”的思考。

既专且通，从涵纳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历史视野出发，是研究党史、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基础要求。何干之针对青年学者历史领域知识较为薄弱、研究议题过于专一的特点，提出：相较于中国长时段历史而言，党史、现代史的时段是极其短暂的，因此要研究阶段的历史，就必须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秉持整体化的历史思维与意识，贯通探索过去、现在、未来间的内在逻辑脉络，“从纵横两个方面，即古代和世界，研究其发展线索和彼此之间的联系”^⑦。只有基于广博

① 何干之：《在泰山乡机关干部大会上关于党史和编写县志的报告》，《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第377页。

② 陈宁生：《在干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3辑，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页。

③ 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何干之文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④ 何干之遗著、刘炼整理修订：《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309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⑥ 何干之：《在泰山乡机关干部大会上关于党史和编写县志的报告》，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第368页。

⑦ 陈宁生：《在干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3辑，第584页。

的通史基础和宏大的历史视野，断代史研究才能明晰全貌、明确历史定位、拓展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也是何干之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观照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创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组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重要原因，“由点及面，层层拓展，把中国革命的历程追溯到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整体思考之中”^①是对党史研究的拓展和有益补充。

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全面辩证地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史研究的总的方法论原则。何干之认为，历史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切忌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在毛泽东思想的相关研究中，何干之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早在1947年讲授《思想方法论》时，何干之即已从主观能动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哲学范畴探讨了人民群众与革命领袖的辩证关系。他指出，领袖的产生是群众智慧的集中，集中的目标是使萌芽的思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而后以此组织和领导群众；“领袖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中国的工农大众在革命斗争中需要产生自己的领导者以指导革命，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所选出的领袖是毛泽东，则是历史的偶然性^②。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内“左”倾思想泛滥之际，何干之仍然坚持以严谨客观的表述修改《中国现代革命史》书稿，删除“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节，将其内容统一纳入“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中整体论述，不是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而是将其视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的一员探索其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并将全书多处“毛泽东领导”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针对在党史上具有重大争议的人物陈独秀，何干之依托史料文献对其作出评价：就其历史地位而言，陈独秀曾经是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战士，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后又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就其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言，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③。这对陈独秀是非功过相对客观的评价在党史研究中长时间占据了主流地位，也深刻体现了何干之全面辩证看待历史人物的研究原则。1961年何干之着手写作《蒋介石传》，对于本书的立足点，何干之认为强调政治性宣传仅从道义出发批判蒋介石是肤浅的，应当论从史出，通过“研究蒋介石封建法西斯专政兴旺的历史规律……揭示中国阶级斗争和政治风云的复杂性”^④，以期总结历史经验。

兼顾政治性与学术性，坚持“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是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教育领域“大跃进”以来，正常的研究与教学秩序受到冲击，党史学界出现要求以毛泽东著作替代系统理论学习的主张。针对党内“左”的倾向，何干之撰写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讲稿。尽管该讲稿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理论与党史叙事相结合，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批判了党史上的路线错误，但无论从其写作源起还是目标指向出发，其中都隐含着对现实问题的观照与思考。何干之指出：革命性与科学性、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是对立统一的，它们都是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只注意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⑤。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是何干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政治领域及生产领域的反思，同样也是作为党史学家，对政

① 耿化敏：《何干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② 何干之：《思想方法论》，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第199~201页。

③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2页。

④ 陈宁生：《在干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3辑，第586页。

⑤ 何干之：《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第323页。

治运动中备受冲击的党史研究的思考。党史研究固然有其政治性、现实性、革命性特征,但从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其革命性与科学性、政治性与学术性应当是一体的。何干之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因为它是革命的批判的科学……它站在革命实践的前面,领导革命实践前进”,因此“理论工作不仅要跟上实际工作,而且还要超过实际工作”,这是党史研究学理化的必然要求^①。囿于时代的局限,何干之对于兼顾党史研究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思考更多展露于研究的具体实践,而非理论阐发之中。陈宁生对此回忆:何干之毕生的学术研究“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两个基本原则”^②。

概而言之,唯物史观是何干之党史观的理论根源,党史观的生发不但为其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开展党史研究工作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根本指导,也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何干之开创和推进中共党史学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

三、研究与教学:中共党史学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对于中共党史学的创建与发展,有学者指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并没有完全确立,不仅其学科体系没有形成,研究资料残缺,研究队伍也不壮大^③。但是中共党史学的创建有一个历史过程,探索中共党史学的发展脉络需要有贯通的历史视野,不能割裂民主革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历史阶段。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党史问题的研究与学习、系列革命史党史课程的开设,事实上构建了中共党史学的初步体系、使中共党史研究学科化建制初现端倪^④,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创建奠定了基础。

何干之正是在对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形成了宽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为其推动中共党史学的创建奠定了学术根基。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何干之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尽管这一时期他的研究重心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体系移植于中国历史研究,但究其根本,研究目的仍然指向指导革命的具体实践。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何干之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主持中国问题研究室、政法学院、政治研究室、教育学院及社会科学系的研究教学工作;讲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思想方法论、《新民主主义论》解说、社会科学概论等专业课程。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何干之坚持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以研究成果支撑教学工作,在教学实践中发掘新的问题,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教学经验,为其新中国成立后推动中共党史学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向规范化、建制化转向,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专业正式建立起来,以党史观为指导何干之对于中共党史学建构与建设的重大贡献也集中显露于这一时期。其推动中共党史学创建的重大贡献主要展现于两个维度:一是在教研室设置、课程体系设计、教材撰写等方面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二是在把握党史发展主题主线、建构党史叙事逻辑框架、拓展党史研究基本空间范畴等方面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的学术体系建设。

1950至1958年间,何干之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历史系主任,为开创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程、筹划完备的教学课程体系做出了积极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何干之力求打破苏联高等教育政治理论课体系的固有模式,坚持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并使之成为

① 何干之:《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1辑,第326页。

② 陈宁生:《在干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1906—2006)》第3辑,第585页。

③ 张静如:《何干之对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纪念何干之百年诞辰》,《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

④ 宋学勤、杨越:《中共党史研究的百年演进》,《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全校必修课^①，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仿照苏联教育模式下开创的唯一一门具有中国自身革命特征的高校政治理论课程。针对本教研室、全国高校教师、研究班学生、函授生、全国高校学生等不同受众群体，何干之组织教研室集体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稿》《关于中国革命史课理论研究实际的方针》《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革命史学习方法提示》《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等140余万字讲义^②。在坚持中国革命史研究教学大方向的基础上，何干之组建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以纵横贯通的大历史视野为指导，尝试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置于中国百年近代史的整体视野、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崛起置于纷杂多元的思潮中探索。同时配合新的教研体系，何干之构想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计划开设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农民运动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革命专题讲座等课程，在历史时限、参与主体、主要内涵等方面进一步拓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范畴。1958年，原中国革命史专业扩展成为中共党史系，何干之担任系主任，这是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起点。此后在何干之的支持下，中共党史系（后改称历史系）向着规范化、建制化发展。截至1964年基本建立起以中共党史为核心，以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工人运动教研室、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世界通史教研室为依托的教学实体框架；在增设中国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专题、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党的建设专题等课程的基础上，形成了基础课、理论课、专业课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基本上建构起相对完整、系统的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架构^③。

20世纪50年代何干之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成为这一时期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程的主要教材，张静如评价“这本讲义确立了中共历史教学体系”^④。《中国现代革命史》教材的突出贡献在于，在部分参照苏联党史教科书编纂模式的基础上，其主要内容和编排体例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演进的独特脉络。何干之明确划分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六大历史时期，将中共党史置于系统的时空体系中探索，确立了全国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的模板范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各省市、高校纷纷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纵观这一时期产生的数十部党史教材^⑤，其历史分期、章节题目、具体表述仍然没有脱离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内容及体例范畴。《中国现代革命史》不仅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教材编写，也同样影响了权威党史通史的编写。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的阐发，其党史分期、章节摆布、部分话语表述都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一脉相承。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系为平台，以中国革命史研究为依托，在教研室设置、课程开设、教材编写等具体实践中实现了对教学实体、教学内容、教学工具全面系统的建设，为推动中共党史学的学科体系创建构建了基本框架。

在中共党史学的学术体系维度，何干之依托《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

① 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42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总结初稿（1957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转引自耿化敏：《何干之传》，第145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科研及辅助单位简史》，1993年版，第16页。

④ 张静如：《何干之对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纪念何干之百年诞辰》，《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

⑤ 如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山东省高等学校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省市、高校编写的中共党史讲义不少于30部。

产阶级》两本重要著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通史及中国共产党专史的书写范式。尤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书写中,全书以反帝反封建诠释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主题、以党的革命斗争展开党史发展的叙事主线,将党的路线斗争和毛泽东思想穿插其中作为叙事线索,以是否具有革命性作为评判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根本标准。从而建构起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①为出发点,以“民族独立和解放”^②为落脚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为经、政治活动为纬,以历次路线斗争为重要节点,逻辑清晰、指向明确、经纬交织、重点突出的党史叙事框架。尽管这一叙事框架是单线的历史叙事,以单一的革命叙事遮蔽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的丰富实践,但其毕竟为新生的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满足了当时历史语境下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合法性的政治要求,使革命史范式在此后近30年的党史研究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

同时,何干之进一步明晰并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空间范畴。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起点的探讨,不同于部分论著以1921年作为探索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间起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书写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时间上限追溯到1919年,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为探索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域、思想基础提供了延展空间。针对中共党史研究面临的研究空间狭窄这一核心问题,何干之提出既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也要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史;既要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域的活动历程,也要关注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既要以中国共产党为根本研究对象,也要关注革命历程中的其他主体,力求形成覆盖“敌我友”的较为全面的研究格局。

纵观何干之的学术生涯,20世纪前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其历史观生发的理论源流,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是其历史观形成的主体因素,革命的历史洪流决定了何干之不是书斋里学者,而是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革命者。其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历史学与中共党史学领域不断耕耘,一生都在践行着毛泽东的嘱托“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③。

回顾何干之的学术思想,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其学术思想具有一定局限性,以革命史研究范式建构党史叙事框架,使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掩盖了党史研究的丰富内涵,对于部分党史问题的思考仍然具有时代烙印;但是对何干之唯物史观、党史观的阐发运用及其创建中共党史学的具体实践,为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具体而言,何干之推动中共党史学创建发展的构想与实践,为中共党史学的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内涵范畴,使其由抽象的概念表达落地为具体的行为实践,初步阐发了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应当涵纳什么内容的基本问题;同时,何干之学术思想的产生有其相应的历史语境,契合了当时的政治要求与时代任务,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在汲取老一辈中共党史学家重要思想资源的同时,也要契合新的历史语境,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高精尖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侯竹青]

①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48页。

②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44页。

③ 胡华、刘炼:《何干之传》,《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4页。